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政务院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等。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进程中，他广泛涉猎新诗、戏剧、小说、散文、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各个领域并均有所建树，又以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介入到文学的思想运动之中。本期着眼于四川、日本、上海、重庆、北京等郭沫若生活、学习、工作、写作的地理空间和文化场域，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学术梳理，感谢廖久明先生在组稿和策划方面所做的贡献。

——主持人：阎晶明



# 日本郭沫若研究现状

□ 武继平

郭沫若的一生，在日本被视为是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尤其是他经历过的四个人生阶段，一直都是日本郭沫若研究的重要着眼点。一是留日时期在白话新诗创作上的贡献引人瞩目；二是弃笔从戎参加北伐和之后亡命日本的十年，博多湾诞生的留学生诗人变成流亡政治家的戏剧性“立身出世”受到研究界的极大关注；三是秘密回国参加抗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人生历程，被视为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进步知识分子主流的人生抉择和自我实现；四是“文革”前的自我否定及“文革”中的自我迷失，被视为可扩展延伸到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体系研究的重要个案。

回顾过去百年历史，日本的郭沫若研究自翻译起步，之后大致经历了一个文学评论、人物及作品研究的发展过程。其规模也从早年的零散翻译和研究逐渐成熟过渡到有一定组织和规模的翻译与学术研究。

对郭沫若作品的翻译应该是日本郭沫若研究的起点。其标志性“事件”是1919年10月天津日本租界的日文刊物《日华公论》(6-3)转载了署名作者为郭沫若的两首自由诗《抱儿浴博多湾中》和《鹭鸶》。录入《女神》出版的那些白话新诗几乎都发表于中国国内的中文报刊。那些作品在日本能够迅速引起广泛关注明显得益于1919年部分在华日文报刊以及整个20年代《朝日新闻》《北京周报》《满蒙》《文章俱乐部》及《改造》等著名日文报刊杂志的翻译刊载。翻译数量有限和译者多为在华日媒记者，成为该时期的特点。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郭沫若研究基本上可归于作家素描和作品简介之类。虽然总体上研究缺乏深度，但翻译方面从20年代相对单一的诗歌翻译向诗歌、小说、历史剧、文学评论、回忆录、政论杂文以及史学研究等多方面铺开，大有形成中国新文学翻译之首的势头。该时期译者众多，其中像山上正义、藤枝丈夫、松枝茂夫、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著名左翼作家、媒体人以及学者的参与意味着日本社会对新时期文人郭沫若的一种价值认同。

1937年7月25日，亡命中的郭沫若秘密逃回祖国参加抗战以及日本警方紧急抓捕相关嫌疑人的报道在日引起轩然大波。多家日媒对郭沫若展开口诛笔伐，谴责他对日本接纳其亡命之“妻之母国”“忘恩负义”。负面评价迅速在社会上扩散甚至波及研究界，以至于郭沫若逃离后直至整个40年代作品在日翻译的数量呈断崖式锐减。然而在这个文学翻译“骤冷”的战争年代，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和甲骨文研究在日本受到了史学界的关切。

1955年12月，新中国第一个科学代表团访日。团长郭沫若作为和平友好的使者，通过多次大型演讲呼吁世界和平，强调不忘母校培育之恩。他所描述的中日友好的未来，融化了日本国民心中的冰雪。20世纪50年代直至“文革”开始，日本再次出现了郭沫若作品的翻译热潮，自传、历史剧和以《女神》为代表的诗歌成为日本郭沫若研究的三大热点。

“文革”前夜，郭沫若“焚书”的自我批判在日本知识界掀起了巨大波澜。研究界主流在困惑之余，作出的反应是放弃与不屑。尽管如此，学术界仍有少数学者锲而不舍。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丸山升、铃木正昭、伊藤虎丸、高田昭二等学者皆于郭沫若研究有所建树，70年代的“飙风之会”在郭沫若研究方面相当活跃，其中学者中岛翠尤以犀利的文学批评独树一帜。90年代的日本郭沫若研究尽管尚未走出严寒，但于该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先后有一批以郭沫若研究为主攻方向的新秀崭露头角，他们于学术界勇敢的破冰活动开始让人感到了一丝暖意。

2003年2月，日本九州大学的岩佐昌璋、武继平和国史馆大学的藤田梨那三名学者联名创立了日本郭沫若研究会。全国会员尽管起步时不足20名，但该会的诞生和《日本郭沫若研究会报》的正式创刊无疑意味着日本郭沫若研究低迷期的终结。自此，日本的郭沫若研究跟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及郁达夫研究等一样走入正轨。截至目前，日本郭沫若研究会发行了会刊24期，并与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始终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

(作者单位：日本公立福岡女子大学)

# 从政治革命话语到多元立体阐释

□ 何 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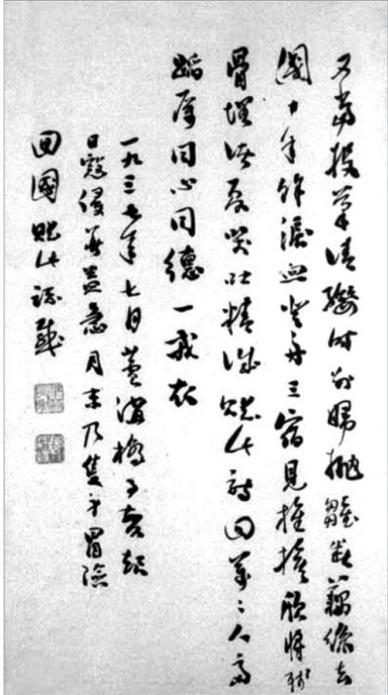
展开，其中以谭洛非主编的《抗战时期的郭沫若》(1985)一书为代表。该书将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和在重庆期间的活动，分为四个阶段加以考查，提出不能把郭沫若在抗战期间的活动仅仅看作他个人的活动，而应该将其作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文化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著者认为，抗战期间郭沫若写下了自己生命中最光辉的一页，达到了政治斗争、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新高峰。全书较为集中地论述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力图做到历史时代和郭沫若本人的结合、郭沫若革命活动的叙述与著作评论的结合、郭沫若本人前后期比较与同时代人成就比较的结合。该书从宏观的纵横两个方面对抗战时期的郭沫若进行了研究，代表了当时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

在1941年的纪念活动中，周恩来曾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领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这与1978年邓小平所说的“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前后相承，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重庆时期郭沫若的叙述和研究。

这一研究范式和视角在新世纪里逐渐有所改观。有的学者回归史料整理、史实考证这一基础性工作，旨在恢复郭沫若在重庆相关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蔡震的《从文献史料看郭沫若参政三序始末》等文，对一些重要史实、史事的疏漏进行再梳理；廖久明发表系列文章，对郭沫若归国抗战等相关问题进行详尽考证。有的学者采用新的阐释理论和方法，对重庆时期的郭沫若进行了全新研究，丰富并深

化了这一议题的认识。如刘奎的《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一书，以“诗人革命家”为方法论角度和中心议题，“将人物与事件语境化、问题化，从而与革命史、党史、文学史及学术史的既有叙事展开对话，先还原人物及其所处语境，所面对问题的历史复杂性。在此基础上，借助知识社会学、观念史乃至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考察郭沫若文学理念、社会实践与政治意识生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必然性”。李斌则重读《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认为相比政治解读和估定其学术史地位，更有意味的是探讨此文的撰述动机。作为知识分子的郭沫若在文中体现了对于复杂政治局势中个人命运的隐忧，并对朝野政党均有所讽谏。王璞近年来对郭沫若与古诗今译的革命系谱、郭沫若的歌德“人民意识”等文，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真辨析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积极展开交流对话，也为郭沫若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1937年郭沫若《归国杂忆(之二)》手迹

# 四川时期的青少年郭沫若

□ 廖久明

郭沫若的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四川度过的，所以，四川时期的郭沫若也即青少年时期的郭沫若。郭沫若本人的《沫若自传》第1卷《少年时代》回忆了自己这一时期的情况。在后人整理的资料中，《郭沫若少年诗稿》《郭沫若家世》《散帚集与游学家书》等与该时段有关，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介绍四川时期郭沫若的相关情况。

《沫若自传》第1卷现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由《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四部分构成，全部写于流亡日本期间。这些自传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浓厚的时代色彩，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看了《反正前后》后，毛泽东在致郭沫若信中写道：“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坦言自己的性意识和所犯的错误。也许是见识有限，笔者很少看见中国人写自己童年时期的性意识，郭沫若却用了整整一节来写。除非是攻击对方，中国人很少写他人的不足，对自己更是如此。但通读《少年时代》，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郭沫若青少年时期很叛逆，甚至可以称为问题少年。

《郭沫若少年诗稿》编者是乐山市文管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收录了郭沫若在沙湾、乐山、成都时所作诗歌31题68首，并附录了20副对联，它们均未收入《郭沫若全集》。《郭沫若家世》由廖久明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

版，由《家族》《长辈》《同辈》《晚辈》四部分构成，其中，《家族》《长辈》收录的全部研究文章，《同辈》收录的关于郭沫若大哥郭开文、原配张琼华的7篇研究文章与四川时期的郭沫若关系密切。《散帚集与游学家书》由郭平英、秦川编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该书由《散帚集》《散帚集外》《游学家书》三部分构成，并在每部分后面依次附录了解读文章《文学珍本(散帚集)见证辛亥革命历史》《(散帚集外)旧诗与对联校注》《(游学家书)的考订编校》，前两部分均收录郭沫若在沙湾、乐山、成都时写作的诗文，《游学家书》收录出国留学前的家书5函(仅第一函写于成都)、留学日本期间的家书63函。除《散帚集外》中的《茶溪》外，其他诗文信均未收入《郭沫若全集》。

迄今为止，已出版郭沫若青少年时期的传记作品7本，依出版时间顺序为：《郭沫若的少年时代》(雷风行，1982年、1985年)、《郭沫若青年时代评传》(李保均，1984年)、《少年郭沫若》(张明军，1992年、1996年)、《郭沫若的青少年时代》(黄子建、廖安厚，1995年)、《狂飙少年郭沫若》(刘屏，1997年、2002年、2012年)、《郭沫若的青少年时代》(丛瑞华，1999年、2012年)、《郭沫若的青少年时代》(蔡震，2010年、2012年)。尽管这些传记作品书名大同小异，具体内容却有较大差别：张明军著仅写了郭沫若在乐山(含沙湾)的情况，刘屏著还写了郭沫若在成都及赴日前的情况，雷风行著写了前往日本留学的情况，李保均著写了郭

# 重审左翼文学研究的空间视角

□ 戚立强

1915年5月7日，郭沫若与吴鹿笙等留日同学为抗议日本对华“二十一条”归国到上海。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到上海，爱国主义的思想底色贯穿于郭沫若和上海这座城关系的始终。郭沫若断断续续总共在上海住过5年光景，可是他一生许多重要的阶段都和上海密切相关，前者是“郭沫若在上海”，后者应是“郭沫若与上海”。郭沫若与泰东图书局关系的研究属于前者，郭沫若与《学灯》关系的研究属于后者。陶晶孙的《牛骨集》、郑伯奇的《沙上足迹》、冯锡刚的《洋场十里更汪洋》——郭沫若咏上海等，给人们勾勒出了郭沫若在上海的概貌。若想按图索骥，就要读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主编的《郭沫若在上海》。对郭沫若在上海的叙述最详细分析最深刻的是郭沫若自己，代表就是《创造十年》与《创造十年续篇》、《行路难》等对都市生活、新旧文学及“新人”关系的剖析也非常精彩。

1919年9月11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发了郭沫若的新诗，上海迎来了中国第一位歌颂工业文明的“都会诗人”。漆木德在《聚焦：对现代上海都市小说的宏观审视》中指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在五卅时期就出现了，最初的代表作品便是郭沫若的《笔立山头展望》《上海印象》等。孙玉石在《论郭沫若的城市意识与城市诗》

中将郭沫若主要写于日本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一些诗歌视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先驱性的探索 and 尝试”。鲍玉昌将《笔立山头展望》视为“现代诗歌献给都市的第一首颂歌”。

通过郭沫若的书写，都市文化开始进入中国现代诗人的视野，但他并非天生的大都会歌者。钱杏邨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中谈到郭沫若时说：“他是一个自然的歌者，但后来是变为一个城市的歌者了。”郭沫若最早表现城市意识的诗篇，写的都不是上海，来到上海泰东图书局后，才开始频繁地描述这座城市的景观，他最常用的比喻是“血海”，最喜欢使用的手法是对比：高耸耸立的大厦与阴影下蚂蚁般劳碌的普通人，坐汽车的富人与路旁的乞丐。吴辰的《诞生于都市中的诗人：论1920年代郭沫若诗歌里的城市书写》、游翠萍的《寓所·街道·风景：郭沫若早期小说中上海租界的空间体验与文学书写》、刘永丽的《郭沫若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殖民地上海》等，从不同角度剖析了郭沫若笔下的上海景观。郭沫若写上海的文字里大都有一股强烈的愤懑的感情在涌动，他对现代都市景观的对比性描述透露出越来越鲜明的阶级意识，这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看不到的。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同人是中国左翼文学的拓荒者，开创了左翼文学想

象上海的范式。

沈尹默以为“上海滩上是谈不上甚么文艺的”，刘半农在《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中说：“听说上海滩上，出了一个大学诗人，可比之德国的Goethe而无愧。”温梓川在《新书业与作家》中将刘半农的话转述成“上海滩上的诗人”。这些带讥嘲意味的言语最早将郭沫若与上海联系起来，也揭示了这位都会诗人的异端性。1920年代，郭沫若在上海发起或参与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文学浪潮，如文人自办出版、革命文学论争等，海上文学强势崛起，“海漂”郭沫若给无数无名文学青年显示了创造奇迹的可能。《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艺术之宫与十字街头：创造社研究》等对此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在郭沫若等人的努力下，文坛迎来了属于创造社的时代，上海滩上谈文艺渐渐成了新的时髦，后来更是成了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

上海的生活经验赋予了郭沫若一种“上海气质”。王锡荣在《郭沫若的“上海情结”》中指出，郭沫若虽然出生于四川，“性格特征却充满了另一种地方特色，这就是上海人气质。或者说，是四川人的才气与上海人的大气融合的产物”，并认为郭沫若“比很多典型的上海人更具有典型的‘上海气质’”。我更倾向于将郭沫若的“上海气质”理解成左翼文化气质，或者说革命气质。郭沫若吸纳的不是上海的腔调，而是上海的骨气。

“郭沫若在上海”永远都是一个常说常新的研究领域。(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 郭沫若与北京城头的月

□ 蔡 震



一九五九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庆贺苏联发射宇宙火箭成功举行的座谈会上讲话

展开以及许多研究成果，但主要集中在一些学术思考的点上，譬如，历史剧《蔡文姬》的创作、学术论著《李白与杜甫》的撰写、《兰亭序》论辩等等。相比较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在郭沫若研究中，还是比较薄弱的一环，远逊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研究。

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关于郭沫若宏观把握和认知的难度。北京在共和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是一个特殊存在，那么具有各种政治文化身份而活动在北京的郭沫若，于其人生旅程中自然也会表现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们是郭沫若过去所不曾有过的人生经历。要对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人生有宏观意义上的把握，做全面的历史叙事，实非易事。而这个把握和认知，又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的基本出发点，它关系到怎样评说郭沫若各个方面的活动，并进行深度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崭新的社会革命和政治态势之中，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郭沫若的诗歌创作走向

出现了新的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题材的选择、审美意识的传递、诗歌表达的方式、语言的运用等都与此前大为不同，“命题”为诗在其创作中成为常态，其诗歌的基本主题则是歌颂。这种种变化既是郭沫若的个人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要评说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就要在政治、文学之间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把握，不然可能会陷入就事论事，以偏概全。

文献史料收集整理的不足，是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研究的另一个原因。郭沫若在北京度过了后半生，身兼各种职务，涉足多方面的政治、社会、文化活动，相关文献史料数量巨大。但在许多方面它们还未能被整理，处于缺失状态。以档案资料为例，郭沫若后半生的工作和经历，有很多都留存于档案资料之中。发掘整理这些档案资料，方可支撑起相关的学术研究，譬如，郭沫若为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所做的工作，为创建、管理中国科学院所做的工作，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办学思想，《蔡文姬》的创作主题，《兰亭序》学术论争的来龙去脉等等。总之，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尚大有可为。(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